“手术”避免一刀切 不会出现下岗潮

处置“僵尸企业”有了时间表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一段时间，“僵尸企业”成为热词。尤其是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后，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有了时间表。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的“僵尸企业”问题正趋严重，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负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有效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分类处理，避免一刀切。而对于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短暂性问题，政府有能力处理好，人们不必担心出现下岗潮。

1 臃肿低效成负担

“僵尸企业”，主要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要求2016年着力做好积极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0424.7亿元，同比下降9.5%，中央企业14650.6亿元，同比下降10.4%；石油、石化和建材等行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僵尸企业”的出现并非偶然。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认为，“僵尸企业”有3个主要成因：一是改制成因，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盛行部分改制而非整体改制；二是历史成因，一些当时因需成立的临时性企业遗留下来；三是企业自身经营机制原因。

2 分类处理寻突破

处置“僵尸企业”任重而道远。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处置“僵尸企业”是化解过剩产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绕不过的坎，是必须做的“手术”。

分类处理成为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良方。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重组，对持续亏损3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就现状而言，分类指导非常必要。具体来看，实施分类指导一方面需要考虑到产业在国内经济的重要性及贡献度，对于支柱产业中的企业既要清理也要有所保留，以推动支柱产业的发展日趋合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符合创新、环保等国家政策标准却又表现不佳的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避免处理‘僵尸企业’过程中的一刀切。”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教授何维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国外经验教训值得关注。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撰文指出，处置“僵尸企业”，美国有成功经验：区别对待，政府不承担过大风险；日本则有失败教训：处理犹豫不决，致使大量富有活力的企业丧失成长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汲取。

3 吸纳就业有空间

随着处理“僵尸企业”的不断推进，一些人开始担心是否会引发新一轮“下岗潮”。对此，专家认为，处置“僵尸企业”带来一定的下岗问题是难免的，但这只是阵痛，并不会引发所谓的下岗潮。

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指出，需要达到一定的人群规模，才能界定为“潮”，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的“下岗潮”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超过1200万农民工的“返乡潮”。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数据，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中国有能力化解就业问题。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就业的能力比第一次下岗潮时强很多，民营企业也相对发达，容纳新一批下岗员工问题不大。

此外，国家正在不断提高保障能力。据了解，国家安排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加大特困行业过剩产能化解力度，这为推动“僵尸企业”退出提供了保障。

“为将处置‘僵尸企业’所带来的失业等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政府还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循序渐进，对于特定企业的处理要提供一定的时间缓冲期，为下岗员工再就业提供充足时间；二是加强国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互动，国家为失业员工多提供职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的机会，降低下岗压力。”何维达说。

热点聚焦

声音

●补贴新能源只是一时之计

下决心发展新兴能源、可再生能源逐步替换传统能源的战略是坚定不移的。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现在刚刚起步，前期投资非常大，如果完全靠市场行为去消化的话，在短期内做不到的。这个时候用财政手段进行补贴，只是给它输血。根本解决办法还是要靠价格机制来调整，让能源价格从目前由政府定价逐步回归到市场定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表示。

●创业应当注重“从小做起”

对于创业者而言，评估自己能力应从两个层面看：第一是企业家自身的能力，包括企业家团队的能力；第二是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前者主要包括战略决策、对前景的把握和对自己态势的分析以及创新发展的能力。后者是企业家自己把自己的想法理念变成一个组织行为，从而最终将其转变为市场经营的能力。小微型企业可能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选择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能把握住未来前景的项目和产品，这都要求“从小做起”。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

●东北振兴需要理念先行

东北要改革创新，首先要申请自贸区，创新改革平台。要树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创新政府行为方式、融资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地方政府要从观念、服务、信誉、成本、效率等方面创造一个全方位的亲商、利商、富商的发展环境，解决创业难、融资难、合作难的问题，以创新、“互联网+”、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传统工业与服务业、产业与城市发展、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表示。 （**凌子琰**辑）

资讯快递

瑞士人民币清算中心正式启动

据新华社瑞士苏黎世电（记者**凌馨**）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作为瑞士首家人民币清算行近日正式开业，这标志着新的人民币清算中心在瑞士这一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正式启动。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庞秀生、瑞士央行行长托马斯·约尔丹和中国驻瑞士大使许镜湖等出席了当天的开业仪式。庞秀生表示，瑞士是建行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目标市场，苏黎世分行的设立是建行实施国际化转型、拓展欧洲网络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增强建行在欧洲的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为中瑞两国经贸往来和金融合作作出贡献。

建行苏黎世分行和瑞士证券交易所还在仪式现场共同签署了人民币业务合作备忘录，双方就人民币交易及清算业务达成合作意向。

贵州与美国高通成立合资公司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高亢**）贵州省人民政府与美国高通公司17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贵州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主营服务器芯片业务。

据介绍，近年来，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是中国第一个获批开展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创建的省份，也是国家明确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此次贵州省政府与美国高通公司的战略合作，将积极推动地区大数据和信息产业发展。合资公司首期注册资本18.5亿元人民币，贵州方面占股55%，高通方面占45%。公司将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专注于设计、开发并销售供中国市场使用的高端服务器芯片。

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发布

本报北京1月17日电（**常量**）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课题组日前以“创建信用示范城市，打造城市信用新名片”为主题，在北京发布2015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排名榜及分指数排名榜单，并召开“首届全国信用城市论坛”。

城市信用环境指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等单位专家发起，用于评价国内各城市商业信用环境状况的一个指数。研发工作于2010年9月12日启动，2011年7月、2012年7月、2013年9月分别发布，并连续3年出版《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

新年首捕鱼满仓

连日来，江苏省连云港市2000多艘远洋捕捞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新鲜海鱼冷藏运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场。

近年来，连云港市加大海洋资源保护力度，通过伏季休渔、人工增殖放流、投放人工鱼礁等方法，使当地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

司 伟摄（人民图片）

中国发布五年规划：

普惠金融加速经济“微循环”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提起金融行业，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摩天大厦、西装笔挺、巨额资金等“高大上”元素。如今，随着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金融业也将走上更加亲民的道路。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作为首个针对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规划》不仅把“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明确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而且要求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并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

那么，如何才能引导金融业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呢？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实质上是一种‘大银行体制’，银行更愿意服务于大企业、大客户，却在普通中小企业、个人消费等一般性业务上有很大欠缺。如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少传统的‘优质客户’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转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小微企业、居民消费等领域，而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重新匹配的过程中，金融要素的供给也要做相应改变。这就是此次《规划》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对于《规划》中“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的目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这对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机具布放的数量、单人或者区域金融服务次数都有一定要求。不过，落实过程中不能硬逼着各类机构去做，只有实现商业的可持续性，才能让银行真正做好普惠金融。

不过，面对普惠金融时代的到来，大多数银行业者还是视其为新的考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韩四喜认为，服务贫困的特殊群体是普惠金融最核心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普惠金融服务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特性，要想平衡好商业可持续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就需要用好技术、拿得出产品。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实就是要补上以往发展不均衡这一课。对银行业而言，需要告别以往的‘高大上’，多一些草根意识，主动降低身段为大众提供服务。这不仅有利于银行在新形势下拓展新市场，更是一种金融业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在微观上做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董登新强调。